

叶汝贤 沈健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相当一部分学者搭建起了全球化凯旋门，高持学术性标语口号夹道欢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此相对甚至相反的是，许多论者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出发得出危言耸听的结论，进而高高扎起了拒斥全球化潮流的意识形态篱笆。这种紧张关系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尤为突出。面对这种“好得很”与“糟得很”纷然杂陈的现状，跳开情绪化、经验性的描述，进入学理性、规范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研究中有识之士的学术自觉与心理动因。郁建兴教授的新著《全球化：一个批评性考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以下简称“《全球化》”）就是体现此一追求的创新性论著，在当下全球化研究中卓然一格，颇值一读。

应该承认，全球化研究作为一门显学而炽盛于学界的客观现实，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态势日益强盛的现实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术研究全球化不断扩展的学理驱使。《全球化》的作者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但他并不是一个学术机会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学术超市商品提供者或采购者。诚如作者自述：“1998年，我国领导人正式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此后，从中国经验出发研究全球化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正是这种对“中国经验”的现实关怀驱动着作者对全球化的思考与探索。这本18万字的“小册子”试图求解“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企求为此“提供某些知识性准备”。作者在开篇设定其学术目标是“论辩全球化分析框架”，尝试在方法论上为当前全球化研究中的盲人摸象现象作出修正性的解读。

全书有三个鲜明特征。第一，凸显了全球化研究中规范性研究走向。《全球化》一书首先对全球化概念作出了经验性与规范性两个层面的区分，认为“主观意义、规范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可以有很多种，而客观意义、经验意义上的全球化只能是一个”，从而为规范意义上的全球化研究确立了一个逻辑起点。然后，对学界存在的种种全球化理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条分缕析，不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而且对全球化理论中的极端主义、怀疑主义和变革主义都作了辩证批判。事实上，自1993年德里克来华作“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专题演讲、1998年俞可平主编的“全球化论丛”出版后，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观点纷陈，既有全盘接受全球化价值理念的激进观点，也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固执抵制全球化的声音。这些对应于国外全球化研究中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论辩，尽管有着种种落差甚大的表征，却在价值取向上惊人一致，实质上是百余年来“体用”之说在当代的延续与变异，是纠缠着当代中国“强国之梦”的一个不可绕过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20多年来关乎国家开放立国方略的一个重大课题。本着“全球化及其理论应得到理性的辩护，全球化需要变革，全球化理论需要批判”的目的，《全球化》一书对此作了理性考察与辩证梳理。该书一方面回应了国内外种种自由主义全球化观点，特别是对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正负面效应作出了剖析，既指出新自由主义带来经济发展，从而走出了国家主义困境的业绩，又确认了其“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本质；另一方面对凯恩斯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路径的全球化理论作了全面考察，指出了国内外种种需要引起警惕的反全球化症候。结合国际全球化研究中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该书接着考辩了在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抽象对立立场上的“一种可欲的全球化替代方案”。

第二，《全球化》一书突出了全球化研究中的现实关怀。在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性国家时，书中引入了费希特和马克思的时间二重性概念。在德国先哲看来，时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必然的、普遍的概念中的时间，另一种是偶然的、个别的编年史时间。前者的流逝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后者的流逝是均衡的，一视同仁的。我国著名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梁志学先生曾在一篇演讲中把时间二重性概念与全球化问题联系起来，《全球化》一书则将时间二重性概念的解释力发扬光大。书中写道：“全球化与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个时间问题。”“在讨论全球化与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在编年史的时间中，中国与欧美各国当然处于同一时代；而从概念中的时间来说，中国的产业革命任务还尚未完成，因而与欧美各国还不处在同一时代。更进一步说，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辽阔，社会发展水平差别甚大，有的地方在讨论修建磁悬浮列车，而另一些地方则在号召为失学儿童捐款，因而不同地区的人也不是同时代人。”这样的讨论，对揭示中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落差，甚至中国国内区域间的差异，从而为解读中国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找到了一把极具解释力的钥匙。

综观《全球化》作者多年以来的学术研究，现实关怀是其一以贯之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这在他以前的黑格尔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已有鲜明体现。《全球化》承继了这一学术研究立场，将全球化分析框架与中国经验紧密结合。全书共6章，每章都在最后一节讨论全球化方案的本土可欲性与可行性。在确立全球化分析框架后，作者吁求我们走出传统的“挑战与回应”模式，代之以“回应与创新”模式，以全面融入全球化为契机推进制度创新及制度变迁。在第4章“全球化与文化”中，对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中国先进文化策略的论述，不仅澄清了国内外盛行的哈贝马斯、罗伯森等学者的全球文化观，还探讨了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上建设既保持本土特殊主义、又契合全球普遍主义的特色文化事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第3章“全球化时代的公共管理”、第2章“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中，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与发展的观照，特别是对当前以“改造政府职能”为目标的行政改革的解读，有如一盘全球化背景音乐伴奏的精神快餐，读之不无一快朵颐之感。

第三，《全球化》一书还拓展了全球化研究的领域，挖掘了全球化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理论等维度上的内涵。此前国内全球化研

究较多停留在经济全球化层面，讨论经济全球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正负面影响。《全球化》作者引述熊彼特“汽车不是马车数量的加倍”这一命题，强调全球化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重要动力，但同样是一个社会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迁过程。全书展示了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新变化。在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角色时，作者既指出“主权终结”论、“民族国家终结”论是一种神话，又提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一方面要调整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加速治道变革，从而确立起一种存在于“治理结构”中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论证全球化与文化关系时，作者借用汤姆林森“非领土扩张化”这一概念，指出全球化并非单纯的技术性、经济性全球化，而是一种深刻的“经济—文化—政治”立体图景中的意识形态输出过程。作为在概念时间中落后的后发国家，必须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借鉴”、“接轨”代替“分裂”、“隔离”，既远离自由主义无视差异而导致的同质化悬崖，又规避文化多元主义的特殊主义追求进行自我封闭的死谷，“着力寻找使全球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有效途经和方式”。此外，在对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考察中，作者将罗尔斯、诺齐克两种针锋相对的“正义论”、泰勒的“承认的政治”观等引入全球化政治伦理的讨论中，加强了建立公正、合理全球秩序理性诉求的论述，增强了全球化新分析框架的立论基础。

必须指出，《全球化》一书专设一章“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后，展开了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前景。国内对此有多种不同看法。作者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出发，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入辨析，提出了“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加速发展壮大的进程”、“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离社会主义是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等结论，剥离了“社会主义全球化”概念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油彩，从当代落后国家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展望了“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建立正和博弈关系、实现双赢局面的可能性”。该书极富针对性地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社会主义必须取得一种新的形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充分吸收世界资本主义业已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性、超越性。社会主义既要敢于融入全球化，又要善于融入全球化，从而将社会主义推进到扬弃资本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形态。

总之，《全球化》一书体现了我国学者建立全球化分析框架的学术努力，堪称当前我国全球化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毋庸讳言，书中还存在着缺陷和不足，比如对于全球化语境中国家角色变迁的阐述固然精当，但对于国家的未来走向，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论述尚嫌笼统，不够深入。对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关系的论述也过于简单。另外，对民族主义的评论几乎付之阙如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我们期望这些方面在此书再版时能够得以改进。

（作者单位：叶汝贤，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沈健，浙江湖州职业技术学校）

责任编辑：刘文旋